

严辰松 主编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

中国翻译研究 论文精选

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系列学术论文集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系列学术论文集

中国翻译研究 论文精选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严辰松 主编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编辑部 编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严辰松主编. —上海: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系列学术论文集)

ISBN 7-81095-657-4

I. 中… II. 严… III. 翻译-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2178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杨 帆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70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657-4 / H · 251

定 价: 24.00 元

《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系列学术论文集》 编委会名单

主 任：庄智象

副主任：束定芳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克非

庄智象

李凤琴

严辰松

束定芳

周世范

徐 珺

张逸岗

编 者 的 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界在引进、消化、吸收和改进国外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反映、总结我国外语学术界在语言学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做好我国外语界学术研究的积累,进一步推动我国外语界的学术研究,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决定分专题编辑出版“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系列学术论文集”。

论文集由我国外语界各核心刊物编辑部负责选题和编排,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研究会初步拟定的论文集专题包括:语用学、语义学、句法学、社会语言学、翻译理论、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

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是一项艰巨、复杂但极有价值的工作,希望得到全国外语界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

序

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在 2000 年年会上做出决定：由外语学刊的 7 家编辑部分头负责，编辑一套系列论文集，以反映世纪之交我国外语研究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按照分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负责编辑这部翻译研究论文集。编辑部将论文选编好之后，主编严辰松教授嘱托我为之作序，我便遵命在此写上几句话。

自 1984 年以来，我国出版界先后推出了多部颇有影响的翻译研究论文集，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通讯》编辑部编，1984）、商务印书馆的《翻译论集》（罗新璋编，1984）、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翻译新论（1983—1992）》（杨自俭、刘学云编，1994）及《翻译思考录》（许钧主编，199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翻译论丛》（耿龙明主编，1998）、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文化与翻译》（郭建中编，2000）等。我们只要翻阅一下本论文集的目录和各论文的发表时间，就会发现本论文集更能体现一个“新”字：所选编的 36 篇论文，属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只有 4 篇，其余 32 篇全是 90 年代以后的成果，而其中 1998 年至 2002 年初发表的竟有 22 篇之多。可见本论文集确实展示了“世纪之交”我国翻译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

再看论文的作者，除 2 人外，其余全是高校的师生，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另有几位崭露头角的年轻博士或博士生。这足以说明，在高校从事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的师生已成为我国译学建设的主力军，创建我国翻译学的重任主要落在了他

们的肩上。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译学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译界学者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认真总结、继承我国译界先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另一方面又注意研究、汲取国外(尤其是西方)翻译理论的精华,从而提高了理论研究意识,开阔了理论研究视野,初步形成了一支理论研究队伍,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为“创立适应我国现实、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现在只能说在译学建设上仅仅有了个良好的开端,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要走的路途还很遥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学科定位上,翻译学虽然在许多国家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我国却尚未确立其独立学科的地位,而只被视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方向,因而在大多数地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我们的理论研究队伍还不够壮大,我们的理论研究还缺少重大的突破,尤其缺少“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的译学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很赞成杨自俭教授给翻译学所作的定位:“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说它是独立的,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目的、内容、方法和理论体系,它代替不了别的学科,别的学科也代替不了它;说它是开放性的,是因为它既关注翻译本身的内部活动,又关注外部的社会文化大系统,还对相关学科开放,可以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说它是综合性的,是因为它能综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性的系统研究,以揭示翻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联系。从这个概念出发,翻译学所要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翻译的性质、过程、原则、标准、方法、技巧等基本因素,还要借鉴诸如语义学、句法学、修辞学、社会符号学等语言学理论,还要更广泛地借鉴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因此,翻译学研究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天地,所有执著的研究者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

才华。在翻译研究中,我们既不要过于悲观,认为翻译学永远是个“难圆的梦”,也不要过于性急,认为我国已经确立了翻译学的地位和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孜孜不倦地去探索、去追求。我们相信,经过广大的、甚至一代代的翻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译学建设一定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为世界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孙致礼

2002年4月30日于洛阳

前 言

从广义上讲,翻译活动始自人类产生交流的需要,其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有文字记载以来,我国掀起了四次翻译高潮:汉代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宗教翻译,清末到建国前的文学、社会科学翻译,以及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各类文体的翻译。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认为华夏文明的长河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干涸,是因为有新水注入,“最大的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可见“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然而,翻译研究却长期不能登上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这多少与翻译研究浓厚的经验性质有关。翻开中西翻译史,关于翻译的最初的评论都是一些翻译家的经验之谈,散见于各种译作的序言或其他文献中。“直译”与“意译”、“内容”与“形式”、“忠实”与“背叛”等二元对立的争论贯穿了传统翻译理论发展的始终。论者采用主观印象式的言论,缺乏科学的依据,因而难以形成系统综合的翻译理论,译学研究便在这种主观评论的模式中裹足不前了很长时间。所幸进入20世纪后,西方语言学迅猛地发展起来,与语言关系密切的翻译研究自然而然地从语言学中寻求理论支撑。五六十年代语言学派的兴起推动翻译研究走上了科学的轨道,到目前为止,语言学或与语言有关的学科理论大多被应用到翻译研究中。70年代以后,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学派蜂起,新说林立。译学研究广泛吸纳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符号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甚至最新的理论思潮,如阐释学、解构主义、女

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都能在翻译理论中寻觅到它们的踪影。到现在为止,翻译学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科学。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翻译理论界在建国后几乎中断了同世界翻译理论界的对话与交流。但改革开放重新开启了封闭的国门。短短 20 多年来,大多数西方翻译理论都被译介进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译学的发展建设。1980 年《翻译通讯》创刊(1986 年改为《中国翻译》),为学者译家发表见解搭建了学术论坛,许多外语学刊也陆续开辟了翻译研究专栏,翻译研究的论著不断问世。广大翻译理论工作者既借鉴西方理论,又挖掘中国传统译学的精髓,对译学展开全方位、多层面的综合研究,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翻译研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为及时总结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受命选编了这本论文集。当然,译学研究的丰富与繁荣远远不是一本论文集所能概括和包容的,面对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囿于篇幅,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

其实,出版界已经推出了不少影响深远的翻译研究论集,比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翻译研究论文集》(1984)、商务印书馆的《翻译论集》(罗新璋编,1984)、湖北教育出版社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中的《翻译新论(1983-1992)》(杨自俭、刘学云编,1994)、《翻译思考录》(许钧主编,1998)、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翻译论丛》(耿龙明主编,1998)、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文化与翻译》(郭建中编,2000)等等。这些论文集采编精心,集某段时期译学研究之大成。但翻译研究发展迅速,90 年代后期到新世纪,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新观点、新成果层出不穷。我们这个集子的重点在 90 年代的译学研究,尤其是 90 年代后期以来的成果,此前的译学研究也略有提及。

我们粗略地把这本论文集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译学理论研究。关于译学理论建设,学者们做了

富有成效的探索,见仁见智。罗新璋(1984)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回顾和总结了历史上有关翻译的各种言论,提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该文一发表,“自成体系”和“中国特色”等概念不胫而走,我国的翻译理论建设要不要中国特色成为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刘宓庆认为中国翻译理论应该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研究依据和依归。他从汉语的语法特征入手,把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概括为重描写的语义—功能模式。张柏然、姜秋霞二位的观点可以说是在90年代对罗文的呼应。他们认为中国翻译学建设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结合科学的方法加人文观照对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进行描述。而香港学者朱纯深则认为对“自成体系”和“特色论”的过分强调,“已经成了中国译学中的两个误区,既局限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也影响了中国译学系统与世界其他译学体系的互动”,并指出不能将语言文化间的差异看作是互动的障碍,或者是对所声称的中国翻译独一无二的特色的支持。

世纪之交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时刻,翻译理论界也涌现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王东风分析了中国译学研究同西方的差距,指出中国的翻译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和广度,呼吁翻译理论界不要把汉语的语言文化特色作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依据,翻译理论的特色应该体现在独创性、系统性和合理性上。廖七一从科学研究范式的角度论证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突破往往伴随着范式的演进与交替,指出中国译学研究迫切需要引进多样化的研究模式,扩大研究视野。吕俊认为中国翻译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语文学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现在正处于解构主义阶段,但解构主义哲学思潮无助于翻译学的建立,要建立翻译学应该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为指导,以普遍语用学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许渊冲(2000)“新世纪的新译论”提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译者应该尽可能发挥译语优势,译作要与原作展开竞赛。他的“美化之艺术论”在翻译理论

界可谓独具特色。卢思源、吴启金二位反思了我国翻译学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展望了面向 21 世纪的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思路。

90 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理论界处于论者所称的“沉寂期”或“转型期”。香港学者张南峰(1995)的“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译学”一文引发了译界对当时现状的深思。他指出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的翻译研究已经陷入了死胡同,因为他们制定的各种翻译标准“脱离了翻译的实际”,过于强调忠实于原文,而忽略了影响译文的因素,并建议中国翻译界从西方翻译理论中汲取营养,扩大研究范围,开展描述性研究。翻译标准一向是翻译界争论颇多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圆满系统的解决方案。辜正坤(1989)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一文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论者思维的单向性,并提出翻译标准应该是多元的,而且整个标准体系应是对立统一而互补的。该文写于 80 年代末,今天看来,的确具有时代的前瞻性。许钧则从三个层面论述了翻译活动的性质和特点。此外,科技翻译在现代翻译活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必要引起学界的关注。方梦之从现代语言学、文体学和逻辑修辞的角度总结了 1980 至 1991 十余年间我国科技翻译理论的研究状况。

第二部分是文学翻译探索。自有翻译研究以来,文学翻译一直是主要对象,许多论著和论文都是针对文学翻译而作,因此这一领域的成果数不胜数。我国的翻译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但学术界对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认识混乱。谢天振倡导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争取一席之地。他认为译作赋予了原作第二次生命,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但译作与原作之间又永远存在差异,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因此,我们有理由承认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孙致礼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回顾了我国一百多年来文学翻译策略的演进与更迭,指出在大部分时间里文学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而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异化的价值,并预言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译法。诗歌可以说是翻译难度最大的一种文学体裁。作为文

体学和叙事学专家,申丹借用文学文体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这一边缘学科对小说翻译批评与实践所具有的理论指导价值。杨德豫分析了以顿代步和韵式转换等诗歌翻译手法,从节奏和韵式两方面总结了把英语格律诗译成现代汉语格律诗的方法,体现了诗歌翻译家精益求精、不懈探索的可贵精神。郑海凌探讨了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问题,认为译语异化是普遍存在于译本中的语言行为和文化现象,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好的翻译是译语的优化,即保持适度的异化。文学翻译的艺术再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艺术创作才能上,袁莉(1996)的“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两难处境、主观向度以及隐性身份,从译者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她认为翻译文学作品要求译者投入感情,与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心神交会。90年代文学翻译界兴起复译热,一些文学名著在短短几年中拥有七八个,甚至十多个译本,郑诗鼎(1999)的“论复译研究”对这一现象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外,袁锦翔探讨了赏析佳译的过程。

第三部分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视角。近年来,中国翻译界又悄然兴起了文化研究热,这显然受到了世界翻译研究动态的影响。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派就开始从文化层面上探讨翻译。在霍姆斯(James Holmes)译学构想的指导下,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的描述性研究。他们一改传统的原文中心论,以译作和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考察影响翻译的产生及接受的准则和规范,如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力量。·巴斯奈特(Bassnett)和利弗威尔(Lefevere)在90年代初率先宣布翻译要走文化转向。十多年来,文化视角已经成为西方翻译理论界一个瞩目的亮点,涌现出不少富有见地的著作和论文,持这种论点的学者被称为“文化学派”。

在中国翻译理论界,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学界前辈王佐良

先生在 80 年代撰文“翻译中的文化比较”。该文指出中国历史上最近几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无不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翻译界前辈中的有心人总是在寻找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东西,严复、林纾和鲁迅等人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功不可没。该文还认为,译作在一时一地所产生的影响的大小与彼时彼地的文化情况有关。遗憾的是,后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研究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重视不够。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翻译界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大多局限于译技的微观研究,缺乏理论的高度。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在这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从本书选编的几篇文章中可窥见一斑。以往的翻译史重在记录翻译史实,而王克非提出要加强翻译文化史研究,探讨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作用和影响以及文化对翻译的制约性。王宁(1998)的“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指出翻译研究理应纳入当前的文化研究,因为后者关注的是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媒。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才能突破以往的“语言的囚笼”的束缚,扩大传统的研究范围。王东风探讨了影响翻译过程的几个跨文化因素,即特定民族文化的审美标准、政治文化和伦理价值观,揭示了“文化的方方面面会根据当时的文化接受状态以不同的程度作用于翻译的过程,介入译者的逻辑判断和语言选择”。郭建中认为异化和归化这两个翻译策略涉及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考虑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这两种方法都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孔慧怡认为翻译界热衷于语言层面的探讨有失偏颇。她从选材、理解、信息传递、当代评价、历史地位等方面分析了主体文化对翻译整个过程所施加的影响,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文学翻译,要从宏观的文化层面入手,全方位地展开研究。王晓元从翻译的动机及文本的选择和翻译过程中的取舍或删改两方面论述了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相互影响。韩子满则指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存在不平等现象,这种文化失衡将影响文

本的选择、策略的选择和译文的接受,并强调弱势文化要在翻译中寻求保存自身文化特色的途径,防止被人同化。许钧探讨了译者及译者所属民族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对翻译产生的影响,对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下翻译应奉行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之,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把翻译从原作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大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第四部分为西方译论研究,包括中西译论比较研究。20多年来,中国翻译理论界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和探讨是中国译学建设不可或缺的源泉。屠国元和肖锦银分析了西方现代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认为西方译论在中国大体经历了译介、研究、反思和应用三个阶段,从方法论和实际研究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蒋骁华评价了近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指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正慢慢从语言学派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向多学派相互争鸣、多学科研究分量加重的方向发展。谭载喜(2000)的“中西译论的相异性”,通过系统的比较,得出结论:中国译论传统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翻译理论的实用价值、翻译经验的规范作用以及译者对于翻译之道的心灵感应和领悟;而西方译论传统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翻译理论的条理性和系统性,强调对于翻译过程的理性描述以及翻译观念的不断更新。这种系统的比较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中西译论的认识。张美芳比较了中西学者在译学构想方面的异同及其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指出翻译界要取长补短,中西互补,才能更好地完善译学架构。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批评思潮对翻译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郭建中系统地论述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及其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的强大冲击。谢天振引证了现代解释学的两位代表人物伽达默尔(Gadamer)和赫施(Hirsch)的不同观点,将它们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伽达默尔否定了作者本意的存在,但指出了理解的历史性;赫施则捍卫作者的本意,继而肯定了文本含义的确定性。两种观点对翻译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

根茨勒(Gentzler)1993年在《当代翻译理论》中预言,90年代“将以翻译理论的繁荣为特征”。如今,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无论是世界翻译研究,还是中国翻译研究都印证了这个预言的正确性。我们期待翻译理论研究在新的世纪里更上一层楼。

衷心感谢本论文集各篇论文的作者慷慨应允本编辑部选用他们的论文。

衷心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本论文集的出版提供便利和帮助。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从事翻译研究的部分师生为编撰本书做出了贡献。孙致礼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并对论文编辑方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博士生刘晓丽、吴南松和金兵老师帮助挑选了论文。刘晓丽还撰写了前言的初稿。韩子满博士对论文的选定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在此也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再者时间仓促,在论文的选择和编辑方面一定还存在问题,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2年3月29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译学理论研究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罗新璋 (3)
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	刘宓庆 (21)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辜正坤 (33)
科技翻译理论研究——十年述评与展望	方梦之 (44)
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	张南峰 (54)
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	张柏然 姜秋霞 (61)
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	许 钧 (68)
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	王东风 (79)
走出误区 踏进世界——中国译学:反思与前瞻	朱纯深 (96)
展望 21 世纪的翻译教学与研究	卢思源 吴启金 (115)
新世纪的新译论	许渊冲 (124)
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吕 俊 (135)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廖七一 (144)

第二部分 文学翻译探索

用什么形式翻译英语格律诗	杨德豫 (161)
寻找译品中的真善美	袁锦翔 (175)
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	谢天振 (185)
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	袁 莉 (196)